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內 部 發 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1963年6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內 部 發 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1963年6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浙江省委員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定 价： 0.85 元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刊印，旨在廣泛積累歷史資料，特別是與本省有關的史料，並促進史料徵集和撰寫工作的開展。選刊的稿件，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或親身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撰寫者是從不同角度來敘述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內容可能不夠完備和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印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參考，不宜外傳。

二、本選輯所選資料，主要是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風尚等史料，均所歡迎。來稿只要有史料價值，不拘体裁；除有關全國性的稿件選送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備用外，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刊登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前后·····	唐中和 (1)
汪伪巨奸各派内鬬见闻·····	何国涛 (23)
汪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	金湛卢 (57)
浙江和杭州敌伪组织的形形色色·····	何致平遺稿 (74) 汪振国整理
汪伪浙江警务处·····	王观涛 (95)
日寇铁蹄下的杭州·····	张 泓 (106)
关于杭州淪陷时期的几点回忆·····	徐曙岑 (118)
杭州淪陷时期金融业概况·····	鄢复本 (121)
敌伪在杭州利用佛教的几点情况·····	全 空 (128)
日本特务芝原平三郎在宁波·····	吕瑞棠 (130)
国民党政府惩治汉奸的真相和对敌伪产业处理的 见闻·····	何国涛 (139)
太虚在浙江·····	大 悲 (165)
流氓头子金廷蓀·····	宁波市政协文史工作组 (170)
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意见·····	(183)

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前后

唐 中 和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企图达到独吞胜利果实、继续奴役人民的目的，决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空军根据这一反革命的决策和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分布情况，于一九四六年夏，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空军军区，将所有空军兵力分驻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西安、汉口、徐州六大基地，准备机动使用，以配合陆军的作战。

西安为空军第三军区，其辖区有豫、晋、陕、甘、宁、青、新疆七个省，地域最大，但其主要任务是配合胡宗南、阎锡山军以及支援兰封以西陇海沿线开封、郑州、新乡一带的陆军作战，企图先打通陇海线、同蒲路，然后大举侵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打乱解放军的指挥部署，从而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但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罪恶的内战，为全国人民所强烈反对，再加蒋军内部的矛盾腐败，所以战争一开始，即处处挨打，空军虽竭尽全力支援，但战区辽阔，兵力分散，且对解放军经常在夜间行动无法侦察，无法阻击，所以胡宗南、阎锡山及沿陇海线的刘茂恩、王仲廉等等部队，仍不免屡战屡败，终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而至全部歼灭。在此期间，我在国民党空军西安军区任职，现将当时亲见亲闻的空军活动情况回忆如后，以供整理史料者的参考。

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的組織及其 所指揮的空軍部隊

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成立時以劉國運為司令，龔穎澄為副司令。賴遜岩為參謀長。劉、龔都為黃埔六期生，又同是中央航校第一期（即航空班）畢業生。劉于航校畢業後，不久考入陸軍大學，以後一直做行政工作，至一九四一年在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當過副司令，深得周至柔的信任；龔在抗戰期間大部在作戰部隊，曾任過大隊長。賴遜岩在抗戰期間大部分亦在作戰部隊，所以劉是比較有一些軍事理論的，龔與賴則有實際作戰經驗的，倒是一個適當的搭配。

司令、副司令、參謀長以下分四個處，這是國民黨空軍經過按照美式編制改革後的統一編制。第一處人事，處長劉秉寬，下面有銓敘、任免兩科；第二處情報，處長曾達池，下面有情報和反情報兩科；第三處作戰，處長向冠生，副處長李麟華，下面有作戰、飛行安全、作戰計劃、空運、飛行等五科，這個處的各科科長全是中央航空學校和空軍參謀學校畢業的正式空軍軍官；第四處供應，處長蘇植藩，下面有補給和軍械兩科。其他還有通訊大隊、氣象大隊、秘書室、督察室、財務科、總務科等。司令部外面則有分布在轄區內的各個場站，還有一個歸司令部指揮的高射炮團（團長葉枝芳），和一個擔任警衛的特務營（營長王良棟）。

駐西安歸第三軍區指揮的空軍作戰部隊計有：一個P—47戰鬥機大隊——空軍第十一大隊，大隊長高品芳，副大隊長曹世榮，所屬四個中隊其中有三個中隊各有P—47飛機十二架，另一個中隊是P—40戰鬥機十二架，共計48架，飛行員自中隊長以下完全是抗日戰爭期間在成都空軍軍士學校訓練出來的第一、二、

三、四期毕业生。他们都會参加了后期的抗日战争，都已有相当的飞行作战經驗。

还有一个隶属于駐汉口轰炸第一大队的B-25轰炸中队——空军第九中队，中队长郭作璋（一九四七年秋調徐飞），副队长麦谷登，有飞机十二架，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属于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有作战經驗的轰炸中队。

此外，还有为了需要而临时調去的是属于南京空军第十大队或上海空军第二十大队（两个都是空运大队）的C-47或C-46空运机約一个至二个中队，飞机十二至二十四架——最少时四至六架，最多时四、五十架，經常輪流駐西安，归第三軍区司令部指揮。

司令部的飞行科本身尚有大的小的“比契喀拉夫脫”各一架，L-5型飞机二架，担任联络。

空军作战計劃作战指揮和一般使用情况

一九四六年九月作者和张唐天、任肇基、韓参四人刚由空军参谋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安第三軍区，张唐天任情报处副处长，韓参任作战科长，任肇基任作战計劃科长，作者任飞行安全科长。十月間作者奉令由西安出发飞南郑、郑州、开封、新乡、太原、临汾、宁夏、兰州、酒泉、迪化（即烏魯木齊）等飞机场站，視察調查各該场站的跑道、油、彈存量、通訊設備、服勤能力、可使用飞机的种类和数量，回去以后，和张唐天、韓参、任肇基等三人共同拟了一个空军独立的作战計劃，那里面以駐西安的作战飞机为基础，西安机场作基地，兵力的使用重点放在偵察上，发现有利目标，进行攻击，以开封、太原、郑州、新乡等机场作为前进地，必要时設临时指揮所。但当时西安及上述各场站所存的飞机汽油已經不多，不能大量使用兵力，隨海鐵路又不

通，如由船运重庆再用汽车轉运西安的办法去經常維持那些飞机的使用，就必须有个极其庞大的车队，日夜运输，这样做事实上不可能，因此計劃就要求二个中队的C—46从汉口經常空运油料至西安。刘国运看了計劃后，在上面批了“是一个好的作业”七个字，意思是这个計劃不切实际的。

在作战指揮方面，司令部每星期一上午有一次作战會議，由司令主持，副司令、參謀长、第一、二、三、四处处长（人事处长有时不参加）、作战处各科科长、第十一大队大队长、轰炸第九中队中队长、通訊大队大队长等参加，會議先由情报处处长汇报轄区内解放军的活动情况，再由作战处汇报上周間的兵力使用情况和准备使用的計劃，供应处汇报所存油弹的数量和可使用车辆及調拨情况，由两个空軍部队长汇报飞机状况，由通訊大队长汇报各个使用场站的通訊設備状况，然后由司令闡明陆軍方面的概况和企图，討論那一周間空軍方面兵力使用的原則、計劃。所以后来事实上就沒有完全根据上面所述的那个总的作战計劃实施。其实照当时情况也的确没有一个可以預定的空軍独立作战計劃，这还因为胡宗南、閻錫山以及开封、郑州地区的陆軍方面，他们不懂得空軍的性能，只知道准备要活动了，就要求空軍給他先去偵察；要想前进了，就要求空軍担任左右翼警戒；被围了，就要求空軍投粮投彈药；总之是依賴空軍，要求大量的使用空軍兵力。因此空軍就无法实施它自己的作战計劃，只是在几个主要战场上好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空軍本身呢，則在几次战役以后，就得出对于善于利用夜間活动、行动迅速隱蔽的解放军，不能發揮空軍应有作用的經驗。因此有时空軍方面，就要考虑节约使用兵力，将一些空軍看来已經失了时效的陆軍情报擱置起来，但由于这样，陆軍方面往往逕报蔣介石的国防部或空軍总部，要求空軍支援；空軍总部則仍轉到第三軍区，指令派机协

助，所以当时空军在几次主要的战役以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着敷衍陆军而使用了兵力。

进犯延安战役的空军兵力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西安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已传聞将有一次重要战役使用大量空军兵力的消息，一、二天后，事情逐渐明朗，是胡宗南部要向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要求空军大力协助。同时空军总部周至柔专派他的随从参谋（似乎是徐世彪，不能确定）至西安秘密传达此事，作战计划科即根据情报处所供给的在陕北的解放军有十三个旅三个师共约十万人的情报和该地区地形，草拟了一个空军兵力使用计划：准备用在这一战役的有二个P—47战斗机中队，一个P—40战斗机中队，一个B—25轰炸机中队。这样就是当时驻在西安的空军第十一大队，除了其一个中队P—47已分驻太原和新乡二地外，其他三个中队及第九中队已全部投入这一战役，这在空军来说，兵力是十分充足的了。

三月七日（记得是这一天，但不十分确切），空军司令刘国运派作战处李肇华、唐中和率C—46二个中队到郑州，由郑州赶运一个陆军师（大约是广东的十五师）至西安，当时，据说那个师战斗力很强，要求尽快空运。

大约十三日左右，空军总部参谋长王叔铭自己坐空运机赶到西安，并由上海第八大队调去B—24重轰炸机八架，同日到达西安南面鄠县机场，又由南京第五大队调去P—51战斗机二个中队二十四架，到达西安机场，于是西安机场包括C—46、C—47、P—40、P—47、P—51、B—25、将近有一百架作战飞机。在一个机场上使用这么多飞机，在国民党空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急需加强指挥机构和基地勤务、加油挂弹检修的能力，

同时对攻击一个据点而集中使用这样大的空军兵力，在国民党空军抗日战争中也是未曾有过的。何况对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在陕北部队不多，地区不大，又没有防空能力，在作战处看来，已是小题大做，浪费兵力，但由此亦可想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一战役的极度凶残和狂妄。

从三月十一日（記得大概是那一天）起空军 P—47、P—40、B—25 就开始輪流不断在陕北整个地区进行偵察，以支援洛川附近的胡宗南部队。

王叔銘到西安后，B—24、P—51 两机种，几乎都由他亲自指揮，在空军大量活动前夕，他穷凶极恶地指示各空军部队长及部份飞行员，要他们在陕北地区注意各条主要道路上的小汽车，如有发现，立即进行攻击；还极端无耻地说要是誰能炸中毛泽东主席的话，奖赏十万銀元（是十万或更多銀元，已記不清，查当时米价每石已至十万元法币左右。）。

十五日晨，据情报解放军在甘泉集結，战况激烈，胡部要求空军支援，这天空军就使用了大量的战斗机和 B—25 轰炸机；十六、十七两日，空军以全力协助胡军向甘泉方面推进，同时以 B—24 重轰炸机对延安进行輪番轰炸，至十九日上午十时据空军偵察报告，胡军已侵占延安。

此役自十一日起至十九日止，空军所使用飞机共約三〇〇架次，据当时陆军报告战果，解放军方面伤亡一万余，被俘三千，侵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外皆知的延安，王叔銘因此自詡为是他得意的“傑作”。

西安陆空军之間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作者在空军参谋学校学习时，国民党空军在一个时期曾发生过空军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問

題，因当时据说有部份陆军高级将领，要求空军隶属于陆军，海军又主张空军分开隶属于陆海两军。因此空军总部派了部份人员去美国学习和考察研究美国空军的制度，回来以后，就坚决主张空军独立，进行内部的改革，完全仿照美国编制方式，总司令部、军区司令部都一致地采用人事、情报、作战、供应四个系统。所以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在西安与陆军胡宗南的长官部完全是两个平行的机构。

空军司令刘国运原是黄埔六期毕业以后又毕业于陆大，所以含有三分之二的陆军成份；而且胡宗南手下的参谋长、处长有些是与他在陆军学校时的同学，因此在深得蒋介石宠信的胡宗南看来，刘的级别低，又是后辈，于是在陆空军双方联系时或要求空军使用兵力时，胡宗南往往着其部属处长以下官佐用电话通知空军了事，而且在电话中也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待空军，这样就引起了空军人员强烈的空军独立感，造成了不少的磨擦。如陆军方面要求空军使用兵力时，在空军司令部的作战处就来个相应不理。在将近半年时间与胡宗南的长官部协作中，刘国运对陆军方面的作战计划，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也因双方独立，互不干涉，因此在空军使用方面就有了一定的限制。这种情况产生后，似乎渐渐为陆军方面所发觉，因而在态度上口气上稍有改变，并且曾主动向空军方面提出，要空军作战处派一科长到他们的作战处来联合办公，借以密切协作；但经空军方面研究以后，认为这样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也没有一个空军作战处的科长是愿去作这个尝试，所以彼此的隔阂一直存在下去。

对陕北发动侵犯时，王叔铭所以亲自到西安指挥空军，其中还含有他和胡宗南的私人关系，他们原是黄埔一期同学，据说王自苏联学习航空返国之初，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但曾得到胡宗南等一期同学的援助，在一九三六年王任洛阳航空分校少校主任

以前，还是一个中队长，抗战起后，他爬升得特别快，终于获得蒋介石的宠信，也是由于胡宗南、俞济时等黄埔一期同学及戴笠等人的支持，于是胡、王的私人交情很好，因此胡对西安空军不大听他的话，自然要告诉身为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的王叔铭。所以在侵犯延安的战役中，王也就特别卖力，调到和出动了多得意外的空军兵力，还亲自赶到西安指挥。

延安空军指挥所的设立

约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五左右，空军据陆军方面的情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撤离延安后，在安塞、清涧、延长、瓦窑堡等地区集中，说中共要人都在瓦窑堡。空军根据这一情报，又不断出动飞机向定边、靖边、瓦窑堡至绥德之线侦察，并向飞行员指明特别注意对瓦窑堡和其通向绥德那条路上的各种大小车辆，但均无发现。与此同时，胡宗南要求空军与他的陆军一样采取措施，至延安设立空军指挥所，派适当数量的作战飞机进驻该地。空军司令部表示同意，并要求胡宗南立即赶修延安机场，尽快建筑一所机场飞行指挥塔，约于二十六日，空军派 L—5 飞机一架，先去作了试降，并在修建工程上作了些指导。约三月底四月初间，当时的京（南京）沪各报记者和空军总司令派出的一部份人员，乘飞机到达西安，再由第三军区司令部另派 C—47 两架，由副司令龔颖澄、科长唐中和陪同他们一道飞到延安，他们之中，空军总司令部的人员主要是视察空军方面的战果，特别是初次试用的 B—24 重轰炸机的威力，各报记者主要是由胡宗南派人陪同参观了枣园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和解放军总部的大礼堂以及延安的街道市容一般情况，在参观街道时，记得有个记者找了一个当地年老的老百姓问他（当时延安老百姓很少）：“国民党军队好呢还是共产党好？”那个老人慢吞吞地说：“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只是我们老百姓不好！”弄得那个記者不好再問，而对站在旁边的我们这些人說：“这里的老百姓都是靠不住的！”

在延安視察和参观了几天回到西安以后，空軍司令部就派副司令龔穎澄和科长唐中和带了一个參謀再去延安成立空軍指揮所，派第十一大队中队长张省三率P—40战斗机八架进驻延安，胡宗南即将原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面与左侧房子拨給空軍使用，机场南端坡上一些民房經修改后作为空軍站及油彈庫。

空軍指揮所在延安連飞行人員、机械人員及场站人員共約四十人左右，指揮所和飞行人員的伙食及往返机场车辆由胡宗南駐延安的陸軍指揮所供給，但大部蔬菜面粉等仍由空軍派机空运。

延安空軍指揮所成立半个月后，副司令龔穎澄就調返西安，改由唐中和在該地負責。

胡宗南在侵占了延安以后，在各報記者面前表现出趾高气扬的神态，但他始終很怕“出沒无常”的人民解放軍的行动，因此自延安設立空軍指揮所以后，他要求空軍出动飞机协助的次数更多了；空軍方面則仍要看来自陸軍的情报和要求而定，认为确有必要就派适当数量的飞机出动协助，认为来的情报在時間上已失去价值的就不派。但虽然如此，有时由于陸軍指揮所一再用电話要求和催促，也派一至二架出去偵察巡邏。

空軍本身的情报，唯一来源是空中偵察。空軍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又因西安方面汽油補給的困难，就尽可能的節約使用兵力，这就不能使陸軍方面滿足要求，因此胡宗南就想对延安空軍指揮所施加压力，企图使空軍完全听他的指揮。有一天他派副官处副处长蔣竹三電話通知空軍指揮所和空軍站，要全体空軍人員去陸軍指揮所参加听胡宗南对其部屬的講話。空軍指揮所认为各

有各的系統，胡对其部屬講話与空軍有什么关系？就通知空軍人員全不去参加。到了時間，他們見空軍人員都沒有去，蔣竹三就开了一輛中型道奇汽車来接，并說：“这是胡先生好意思，不去不好。”蔣竹三是胡的亲信，实际上是副官处的負責人，他平时与空軍方面联系接触較多，如空軍方面在延安使用的汽車、伙食、建造浴室……等等不少問題是由他协助解决的，因此情面难却，研究結果由唐中和一人去参加了那次胡的講話，但是他在講話中并没有談到有关空軍方面的問題。过了几天胡宗南又令其副參謀長薛敏泉打电话給唐中和說：今天晚上胡先生要你去談談。那天晚上当蔣竹三陪同唐中和到了胡住的窑洞門口时，薛敏泉已在那里等候，后来进了胡住的窑洞，只见胡一个人正立着看牆壁上貼的一張插滿了紅藍小旗的陝北形勢圖，見唐进去，他只叫“好！好！”就到壁架上拿了一瓶威士忌酒，其他什么菜果都沒有，他說：“今天同你喝这一杯酒，我是不会喝的。”說完就一飲而尽，接着他先問了問空軍人員在延安的生活，有无要求，好象很关心空軍似的；再說到他企图使用大兵力找解放軍的主力決戰，希望空軍指揮所多使用飞机配合陸軍的行動。唐中和就告訴他：“并不是空軍方面吝惜使用兵力，实因有許多由陸軍方面去的情報，从情况發生到传到空軍指揮所，其中相隔時間太久，有多至十几至二十几小時的，这在空軍看来，已失去价值；空軍方面所要求的，这种時間不超过二小時（这是作者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中美空軍混合团，美方的空軍指揮官是这样要求的，所以当时就以此作为根据），因为空軍拿到情报以后，即使立即采取措施，至少也要加上飞行前的准备時間和到目的地的飞行時間，这样情况可能又有变化。”胡听了再沒有提出意見，只問在旁边的薛敏泉：“为什么我們給空軍的情報这样慢？”这就是当晚所談的中心問題。

从那次以后，陆军指挥所常在空军住所请空军人员吃饭，那都是由副长官裴昌会出面主持的，因此以后有许多次需要联系协商的事，空军方面就打电话找裴。纵然如此，当时在延安的陆空军之间的隔阂还是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胡宗南本人自以为地位高，看不起空军里那些毛头小伙子。

延安从建立陆、空军指挥所以后，西安、延安之间就不断使用空运机。有一个短时期（几个月）还规定了定期的班机，如延安的中央银行分行和它的大量钞票，都是由空运运去的；还空运了一个由国防部派出的以魏大铭负责的电台侦测组，后来据说这个人是个大特务。他到延安以后，胡宗南对他的工作很重视，就指定他住在空军指挥所对面一间房子里，中间只隔得一间正厅，所以能看到他房里摆的一些电讯器材，窗子外竖了一杆天线，他整天在里面埋头工作，据说是在侦测新华社的所在地。另外又给空运了一部分建造“蒋委员长”官邸的材料，那个建筑，花费很大，全部砖瓦都是由西安运去的，落成以后作者也曾由蒋竹三陪同进去参观过一次，里面咖啡色漆的条木地板，沙发用具，一应俱全；平时锁着门，有专人看管，不让人进去，但“蒋委员长”从没有去住过一次。

胡宗南的指挥所在延安日子稍久，其手下的高级幕僚打牌跳舞，大吃大喝，就无所不为。如有一天晚上，一个军的参谋长（姓名已记不起）找了他们电台里的一个女报务员同道跳舞以后，用酒灌醉了了她，不让她走，经她叫喊闹出，半夜摸到空军指挥所敲门呼救，要求空军派飞机送她返西安，次日该参谋长还告诉她的电台台长不许她声张；中央银行延安分行则是那些人大吃大喝打牌胡闹的场所之一，他们只瞞住胡宗南一个人。

延安空军指挥所是第三军区司令部作战处科长以上人员轮流前去负责的，惟因唐中和亦曾在军校毕业，与陆军方面的关系较

好，所以在那里負責的時間較長。

大約一九四八年三月間，胡宗南在陝北的部隊在一年之間被人民解放軍逐步殄滅，非但不能再發動攻勢，連延安外圍甚至有時連飛機場都要受到威脅，因此空軍開始撤離延安返回西安。

延安空軍的撤退工作，空軍司令部亦派唐中和前往負責。當時在延安的陸軍人員及陸續遷去的陸軍眷屬，聽說空軍要撤退，人心十分慌亂，每到空運機到達機場時，他（她）們背着行李，攜着兒女，趕至機場，要求空軍給他（她）們搭機，每一次這樣同時有幾百人湧到機場，吵吵嚷嚷，這個要求讓他先搭，那個也要求讓他先搭，秩序無法維持，因此空軍只好決定在它本身所有機械及場站人員撤出延安後，這一工作即告結束（陸軍方面人員也撤了一部分）。記得後來到胡宗南的陸軍指揮所撤退時，更是一片大混亂，在他們撤退途中空軍還曾經派空運機去空投糧食（大部是燒餅），狼狽之狀，可見一斑。

蟠龍戰役

胡宗南部於侵占延安以後，集中使用兵力，企圖尋找陝北的人民解放軍主力決戰，他一面要求空軍派機封鎖吳堡附近黃河渡口，見到黃河里的船只木排都炸，以阻解放軍的東渡，同時派飛機偵察解放軍的行蹤。胡一聽到解放軍主力正在安塞休整，就趕到安塞；等他們到了安塞，解放軍已到延安以東地區，他們又趕到東，但始終象捉迷藏一樣，找不到解放軍的主力。在這種情況下，空軍的處境也很困難，因為戰區大，派駐在開封、太原等地的空軍部隊也不少，而且要及时調防，又因飛機使用太多，當時幾乎每個中隊要有三分之一的飛機必須進廠檢修，西安汽油的存儲也不容許經常大量的使用兵力，所以在當時空軍司令部有一次作戰會議上情報科長姚岳崙報告情況時說：“現在胡宗南的鼻子